

13.01



闽清党史汇编

3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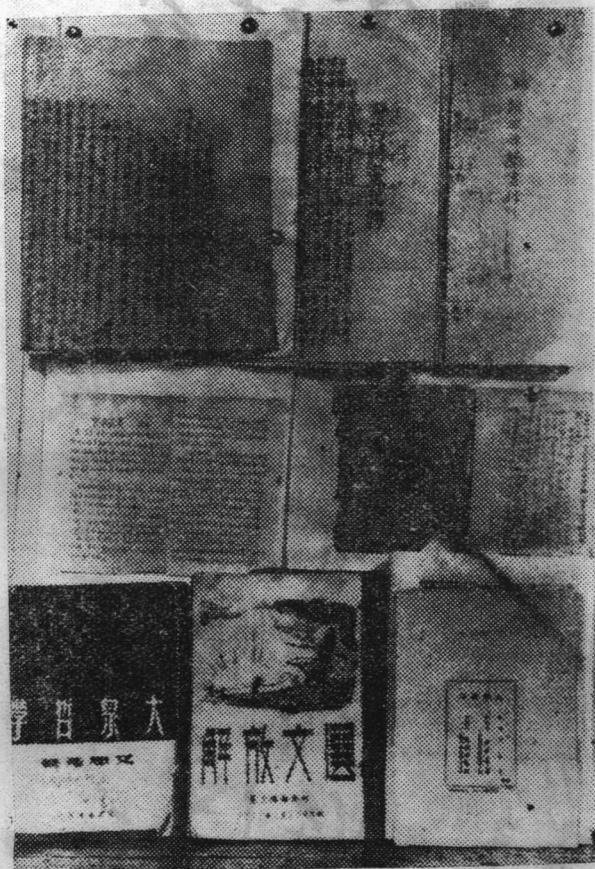
AW 11 / 1920 / 0503

中共闽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小组办公室

胡耀邦同志关于创作党史题材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批示

今年一月十二日，胡耀邦同志对冯文彬同志的一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革命文献一束



这是老同志献交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部分文献资料（书籍、传单、布告等）

革命文藝第一

各位收集資料，系統整理，撰寫成書。這對後來的建設女們將會起創一定作用。

李吉市
張光

城文

(李吉市、單封、藏年) 林光

党史可以教育后来人
承前启后继续为共产主
义事业英勇奋斗

刘鄱夫

一九六六年
四月

目 录

1. 回忆红军时代……………张昌龙 (1)
2. 找党到延安……………黄开云 (5)
3. 北上延安抗日去……………刘村夫 (12)
4. 闽北游击队在闽清活动片断……………左丰美 (18)
5. 伴岭基点的建立和打九都盐站斗争情况
及其他……………江作宇 (20)
6. 破仓分粮 赈济群众……………郑荣堂 (24)
7. 对闽清的回忆……………祝臻华 (25)
8. 闽清城工部的革命活动……………黄世杰 (27)
9. 闽清城工部活动片断……………刘鸿钟 (30)
10. 地下党城工部在下祝、东桥一带的主
要活动……………毛瑞翔 (34)
11. 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页……………刘希明 (39)
12. 关于闽、古、林边境党组织活动情况
……………张元筹 (45)
13. 回忆余天等同志参加革命斗争情况……………郑其土 (50)



回忆红军时代

张 昌 龙

我原名张恒源，一九〇八年农历二月出生于闽清县省璜乡十都坑口村。父铁匠。家庭贫寒，田地全无，只有打铁工具一套。小时为地主家放牛，十一岁随父到沙县打铁。十二岁父去世，随乡人打铁，后当修枪械工人。

一九二九年在古田县岭头镇修枪械，同伙有个古田县人吴姓工友，这个人地下党，木匠，这年年底到坑口我们家，问我们敢不敢参加革命，敢去，他就带我们到闽北苏区造枪。说那里有打富救贫的朱毛红军，官兵平等，没有地主，也没有要饭的人。并说到那里当造枪工人，不受压迫，也有报酬。他的话很合我们的心意。于是他就把我们造枪工人一行六、七十人组织起来，带着工具，步行七百多里到崇安苏区。坑口村和我一起去的有张亨居，八都有刘吓四，还有一些人，一块参加革命。

我们到了崇安岚谷这地方，住在岚谷再进去十五里的小溪坪。开始时兵工厂属私人性质，工人自己制造步枪卖给红军，每支一百元。以后因红军经济困难，并对我们进行政治阶级教育，不断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除少数工人自愿回家之外，我和五十多名工人于一九三〇年一、二月间自动报名

参加了红军，兵工厂就归红军直接领导。不久我们造了几十支枪，同时打下岚谷周围几个乡村，附近十八村民团的枪也被我们缴过去。据说刚开始革命时只有两条半枪，而那时我们造的枪都是用熟铁，没打几发枪筒就发热不能连续打。由于红军作战的需要，同年八、九月间抽三分之二的兵工厂人员去赣东北红十军，闽北仅留下十几个工人修枪造刺刀。我到了江西方志敏同志那边，在江西弋阳成立兵工厂。三一年开始造子弹，刚开始造子弹是利用打过的子弹壳，做个锡弹头和底火就可用，但锡弹的力量不大。到三四年才会造铜头子弹，那是我三三年到中央苏区兴国去参观回来才会搞的。一九三二年我又随红十军打回福建，这时打下浦城，打下赤石街，打下崇安城。打浦城时我脚跌伤留在大安，红十军又回江西。我就在闽北红军平雪兵工厂，有一百多工人，但真正会造枪的只三、四个人。当时的根据地就在大安街，兵工厂在大安街的范且村。

为配合红军闽北独立师作战的需要，兵工厂根据军委会的决定要修械处随同军区搬到崇安城去工作。修械处去后，兵工厂除造子弹、炸弹之外，还要负责修理江西方面红军的枪支。同年九月间，红十军第二次进军闽北时，到达第二天就在各机关部队进行肃反，晚上半夜里将我们修械处的几个师傅都逮捕了，仅留下学徒。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第三天在河边广场上枪毙了几个，布告上说是AB团，改组派，过左的做法，造成人心惶惶。三三年二月兵工厂主任和特派员也被逮捕，只剩下我一个，以后抓了一个俘虏兵和我在一起，一共只有二个人会造枪，所以三三年初修械处和兵工厂合并后，我就当了兵工厂主任。

这时兵工厂在范且村，扩大到近三百人。形势发展要求工厂扩大生产，技术上必须实行科学分工分科，于是就分别组成修械科，子弹科、炸弹科，另外还设制造工具科。修械科专门负责修理枪支，造手提机枪。子弹科负责制造长短枪子弹。炸弹科专造炸弹和地雷，包括翻沙在内，翻沙时各科都派人做模型，一次要工作一昼夜。此外还派七、八人到独立师师部修理枪支。当时任务很重，平均每月要造子弹十三、四万发，炸弹和地雷每月要造七、八千个。工厂虽有三百人，但懂技术的师傅少，完成这一繁重生产任务主要靠自己培养学徒。当时青工的劳动热情很高，从白天到晚上不停地工作，夜里常工作到十二点，没有电灯用汽油灯，没有油用竹片代替，一个人点着竹片，一个人做工，我们就是这样完成每月的生产任务。同时积极开展生产竞赛，在每年的红“五月”、“七一”、“八一”各大的纪念节日，各厂与各部门的竞赛中，兵工厂总是夺得第一名，超额完成任务。

红色兵工厂从一九三四年初，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平均每月造子弹十五万发，炸弹由马尾弹改造为木柄手榴弹，爆炸力增强，每月造手榴弹和地雷一万个。当时闽赣边区的红军除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外，主要依靠自己的兵工厂制造，以消灭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凡是同红军作战过的白军，都说红军的枪炮真厉害，只要挨到边就不得了。尤其是退出大安街时，在所有的房子内和园子里、锅灶里到处都布满了地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房子都不敢进去住。又如在四渡桥之战，坚持了很久，阻击了敌人前进，除以碉堡对敌人碉堡外，地雷给敌人威吓很大，由此扩大红军的政治军事影响。

兵工厂困难很多，一是技术工人少，二是原材料困难，三是工具不足，但我们都逐步克服了。技术工人少，决定从参军青年中选拔学徒自己培养，一个师傅带一百个学徒边干边学；原材料缺向军委请示，提出在苏区进行全民动员，号召群众献出钢、铁、铜、锡等物资；工具不足自己制造大小老虎钳和各种夹具，困难终于被克服。

最困难的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主力红军长征，国民党部队全面向苏区进攻，我们兵工厂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随同军区部队进入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适应情况变化，兵工厂将人员分散，有的到部队修械，有的坚持原地斗争，兵工厂由我带领同军区部队一起行动，正经江西铅山石垅向桐木关方向行动，李得胜叛变，打了一仗，无线电台丢失，以后就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困难得很。后来俞雅鹿、王文波负责兵工厂，我到省委机关去当教导队政委，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黄立贵师长，生活作风很艰苦，作战勇敢，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关键时刻，总是挺身举枪带头冲锋。他战斗、生活总是和士兵打成一片。平时对战士非常爱护，战时要求严格，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惜牺牲了。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国共合作，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我们到江西铅山塘街集中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和六团。我到三支队司令部军需军械股当股长。

一九五六年因到福州办移交，顺道回闽清一次，看到闽清有很大变化，很高兴。

（本文根据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访问记录和崇安县党史

办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未经张昌龙同志审阅。张昌龙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享受副军级待遇。）



找党到延安

黄开云

我认为你们出来跑一跑，倒是顶好的。现在搜集资料还是好时候。假若老同志一去世再搜集就不好办。

我没有很好地准备。你们来信我已收到，并且告诉了刘村夫。

我和村夫去延安之前，尚未找到党。1936—37年，在闽清未找到党，因此我们的进步活动不可能得到党的指示。

说起思想变化，早一点的是黄开修、许俾绥，我们在文泉中学（县立第二中学）读书时，主要是阅读进步书籍，例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的作品，再就是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这些都是思想启蒙。更直接一点，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时在二中，大家都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当时就有抵制日货，不买日货人造丝，我们学生就开展宣传，有了行动。

这个思想变化，也很自然。一方面在学校读书，比较集中，二中虽然闭塞，但我们家乡到福州念书的很多，如黄培晓；他原来是比较进步的，他在泉州日报社工作过。后来我到福州医专，毕业后又到了上海，懂得东西更多了。抗日战争开始，我哥哥开修当时在江苏淮阴县文化馆工作，淮生侄儿就在那里生的，八月份我帮他把嫂嫂小孩送回乡。到家后，我们的事情都不太多，开修装了一个土收音机，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准备做点事。到了晚上戴上耳机，我们就收听解放区电台，并记录下来，刻上蜡纸，就办起了抗日救亡旬刊，后来稿子多了就改为周刊。自己听，自己印，发给中小学，还寄到外面要求交换，寄到福州、厦门、泉州、武汉、长沙、延安解放日报社，他们及时指导我们，这样，共产党的活动，部队的活动都知道了。稿件也就多起来了。办起周刊就比较容易了。救亡周刊，传播比较广，起了进步作用。开头每期只印几十份，后来印到百份以上，出刊时间大约是1937年7、8月至1938年3、4月份。

开修在办周刊中，起了主要骨干作用，有一段时间我带一点药到金沙舅舅家看病，开修一个人从收到发，很忙。1938年3、4月开修参加南平专署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我就顶了一段，还代他顶金山小学教员（文定小学）。开修在南平认识了王一平。当时南平那个专员比较进步。我到金沙时，常到云龙小学（十四都金沙）走走，我知道有个刘亨南（村夫），就留个条子，到舅舅家谈起来，两人思想比较吻合。谈了以后，我们也希望多通信。许俾绥思想左倾比我早，在一起我们经常争论，他有个特点，老爱提反面的问题，使争论更加深入，如讨论托洛斯基问题，他说你说托派

不好，怎么不好，要说得上道理，也包括对张国焘的争论，怎么一个人到陕北后又跑出来到国民党那边去？他肯用脑子。有时他也帮我们发寄救亡周刊。刘村夫来了也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黄培聒、黄至银几人有时也帮一点忙。

在金山小学代课时，许俾绥和许坚善校长都支持我组织学生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我自编自导，当时我22岁。

我代课两个月，想这样下去也不行，找党也找不到，活动也受限制。我们找过刘子萍，他在厦门被抓过，抗战开始放出来，他的意见最好去找刘子崧，当时子崧留学已经毕业，刚从日本回来，在协大当教授。我就把这个意见告诉刘村夫，反正能找到党就行。我和村夫商量好，要北上延安。但不能公开说，村夫准备了路费，我对母亲说，要去福州买一点药得要一笔钱。这事许俾绥知道，他说，你走也好。还送我和村夫到湖头，三人还拍了相片留念。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我和村夫同到福州，找到刘子崧，他意见要找王助。我们到福州安民巷三号新四军办事处找到王助同志，他的意见留在福州活动。我们找他两次，向他学一点革命道理。我和村夫意见，让我们去延安学一段再回来。他说好，给我们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到南昌找黄道，一封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八月中旬我们直接到了长沙办事处，徐特立接见我们，开了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

从长沙经武汉到西安比较顺利，接上头，在西安住两天，下了雨，西安办事处泥巴多得很，我们都住在里面。但麻烦的是咸阳，国民党要盘查。他查他们的，我们二、三十人就转过去了。但也有被国民党扣留的。步行一天走几十里，走了五、六天才到边区枸邑。大约是八月底。到了解放

区我们高兴极了，大唱抗日歌曲。九月三日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几周年纪念会。当时我们住在离看花宫两里路的第39队。看花宫是个镇，女同学编为38队住在那里，李维汉的女儿就在38队。我们是四区队39队，有个区队副队长，讲福州话。从九月至十一月，我们学《社会发展史》、《游击战争》、《哲学》、《经济学》这几门课。生活很紧张，过着部队生活，区队、大队、中队、班。生活上一个是天气很冷，尤其到十一、二月，下雪，我们没有带什么衣服，毛衣毛背心什么也没有，穿着单衣，因为思想比较单纯，只带一些小册子、单衣。当时还没有发衣服，公家给一点棉花，衬衣和单衣放点棉花缝起来就是棉衣了，裤子也一样，夹着棉花，不会缝的缺衣的互相支援，我和老刘带的衣服比较少，因为不是公开走。吃的是小米，有点味道，开头吃不惯，馒头面很少，一周两三次，冬天吃一点土豆和玉米面，陕北属贫困地区，老百姓生活也比较苦。住，八、九十人挤在一个土炕上，下铺高粱、玉米杆。公家发点棉花自己缝被子。穿得各式各样，没有看到因为生活艰苦跑掉的。每天大唱抗日歌曲，革命气氛非常强烈，与现在大有区别。精神上愉快兴奋，生动活泼。那段生活顶值得回忆的，那真是磨炼人。到了十一月结业了，大部分同学到前方去。我在高中部，村夫到了中央行政干部训练班。这时训练内容比较深一些，住在看花宫，人数比较少。比较正规，讲中国革命史是何干之，张仲实讲经济学，李凡夫也讲哲学课，罗迈也常做报告，校长是成仿吾。1939年6月，国民党搞磨擦，我们到何家山上去开荒，后又步行去延安住在桥儿沟鲁艺里面，这时听了毛主席讲三大法宝，印象特别深刻。不久大部分同志上前方，

我因痢疾病留下来。中央组织部知道我是学医的，分配我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当大夫，这时是1939年9月我23岁，傅连璋是中央卫生处处长。中央卫生处，下属单位有门诊部，中央医院，中央党校卫生所，女大卫生所，学生疗养院（青干训练班），枣园卫生所，兰家坪卫生所，中央印刷厂卫生所，鲁艺卫生所等。在门诊部，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困难，有个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制造有药棉、消毒纱布、中药。十一月份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封锁，不给经费，要把共产党困死。药品缺，我们自己想点办法，制造酒精，土药，如硫酸钠从盐碱地上提炼把氯化钠与硫酸钠分开，制的还不少。棉花缺，在延河里找青苔晒干作为药棉的代用品。

我找党，终于在1939年11月由黄慎、温耀中、傅连璋介绍入党。

1939年11月至1943年上半年，这段比较困难，特别40至42年，粮食不够有时也吃点黑豆和野菜。工作也很艰苦，门诊部只有三、四个医生。门诊部要到各处去看病，我开头是医生，以后是主任，主要搞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党校、延大的保健机构都得管。1944年到中央医院搞办公室主任，傅连璋兼院长。三月份抽出来搞七大的准备工作，即七大代表的保健工作。七大从四月份开到六月份。

七大开过以后，张鼎丞同志准备回闽粤赣工作，集中二百多人组成南下干部队。当时毛主席都讲话，要扩大解放区。我们集中一段时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干部队从延安出来，到太行左权县前方总部，中央来电要我们北上，留下二十多人，其余全部北上，准备占东北。住在河北玉田，碰到林彪，热河程子华要干部，林彪定下来把我们这些人派到热

河承德，少数人到东北去。我在热河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带一部分同志到朝阳、锦州。支援司令员李运昌，准备打仗，组织一个战地医院到朝阳，1946年1月13日打了平原战役，这一仗是肖克指挥的，打得不错，平原稳住了，承德保下来，国共两党签了停战协定。我们把伤员转到冀东，又回到承德去，我到热西军分区任卫生处长。1946年6、7月份我带分区卫生处第三国际和平医院，往西转移到赤城。当时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大踏步撤退，够困难的。到了九、十月份，才比较稳定。到了年底，成立冀热察军区，我任区卫生部副部长，不到一年，47年底又分纵队，我留在军区卫生部任部长，王旗纲同志任政委，一直到1949年2月，第二次解放张家口，军区迁到张家口。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流动性很大，在冀热察军区我们卫生部下属有几个所，收战场伤员，有野战医院，也有后方医院，随部队流动作战。药品很困难，打下中小城市买一点，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一点，没有碘酒，就用盐水，我们要独立行动，一方面要提高士兵觉悟，号召青年参军，一方面还要提高警惕，预防地主还乡团和土匪的袭击。毕去非同志就差一点被土匪抓住，我们两个通讯员被抓去杀害了。仗打大了，任务也大。打锦州时，我带一个野战医院三个所，要准备接收十万伤员。动员住地老百姓组织起来，一个村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要管二至三百伤员。医生护士只能治病，一般护理全靠人民群众。结果仗打得好，我们只接收千余伤员，包扎后往根据地送，我们只有一个警卫排，站岗放哨、通讯、侦察、转移，任务很重。中央三月份开七届二中全会，为了准备全国胜利后的接管政权工作，第一批抽全国

五万三千名干部准备南下，冀热察军区与晋冀军区合并，我们在正定休息，四月初南下在合肥停下来，遇见张鼎丞同志，当时他是华东局组织部长，发个电话给干部队，把我调到华东局去。在华东局遇见黄国璋，他来汇报工作，与他住在一起。我们于四月二十三日过江住南京总统府，后住丹阳。杨采衡也参加了，当时我们几个人搜集材料，到南京一块去寻找国民党报纸，翻材料，准备编写福建情况，供领导参考。五月三十一日我们进了上海，住复旦大学，继续组织编写，另方面招兵买马，组织南下干部服务团，这是张老看得远，组织有二千人左右，包括胡平同志。卫生干部也有几十人。厦门一解放，我到厦门任卫生局长，1950年3月任福建卫生厅副厅长，以后任厅长至56年4月。并曾兼任福建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福建开头主要是抓防治鼠疫、天花、霍乱三种主要烈性传染病，到53年初就消灭控制了。再一个是消灭地方病如：血吸虫、麻疯病，也花一定力量。并办康复医院和精神病防治院。1956年从福建调到北京任保健局副局长，1957年9月任北京中医院院长、党委书记。1961年在卫生部医疗器械局任局长，1979年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局副局长，1982年12月离休。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